

21世纪普通高等院校文科示范教材

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教程

主编 邓新华 章辉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1世纪普通高等院校文科示范教材

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教程

主编 邓新华 章 辉

参编 王 诺 曾 军 刘月新 贺天忠

张金梅 张 贞 边利丰 郭 勇

李文斌 余 锐 陈全黎 张慧敏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 20 世纪文学批评教程/邓新华,章辉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1

21 世纪普通高等院校文科示范教材

ISBN 978-7-307-12718-0

I. 西… II. ①邓… ②章… III. 文学评论—西方国家—20 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2201 号

责任编辑:易 瑛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1 字数:506 千字 插页:1

版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718-0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精神分析批评	11
第一节 精神分析学的历史起因与流变	12
第二节 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	14
第三节 精神分析批评的主要观点	19
第四节 精神分析批评实践	24
第二章 新批评	35
第一节 新批评的历史缘起	36
第二节 新批评的理论观点	37
第三节 新批评的批评方法	42
第四节 新批评案例分析	50
第三章 神话—原型批评	60
第一节 神话—原型批评的三个理论来源	61
第二节 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内容	68
第三节 神话—原型批评案例分析	74
第四章 结构主义批评	79
第一节 结构主义的历史背景	79
第二节 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观点	85
第三节 结构主义叙事学	88
第四节 结构主义批评案例分析	97
第五章 当代社会学批评	102
第一节 社会学批评的产生与发展	103
第二节 发生论结构主义社会学批评	107
第三节 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批评	113

第四节 当代社会学批评实践	117
第六章 解释学批评	124
第一节 解释学批评的历史发展	124
第二节 解释学批评的理论观点	129
第三节 解释学批评的批评方法	133
第四节 解释学批评案例分析	138
第七章 接受—反应批评	146
第一节 姚斯的历史分析方法	146
第二节 伊瑟尔的文本分析方法	151
第三节 读者反应批评	155
第四节 接受—反应批评案例分析	160
第八章 女性主义批评	170
第一节 女性主义批评的历史缘起	170
第二节 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观点	176
第三节 女性主义批评的批评方法	180
第四节 女性主义批评案例分析	183
第九章 新历史主义批评	191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	191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观点	195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	201
第四节 新历史主义批评案例分析	205
第十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上)	212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概述	212
第二节 卢卡奇的文学批评	217
第三节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与“症候阅读”	221
第四节 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	225
第五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案例分析	229
第十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下)	235
第一节 阿多诺的否定性批评	236
第二节 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	241
第三节 马尔库塞的审美政治批评	246

第四节 法兰克福学派批评案例分析	249
第十二章 后殖民主义批评	257
第一节 后殖民主义相关概念释义	257
第二节 后殖民文学	261
第三节 后殖民理论	265
第四节 萨伊德的对位阅读	274
第十三章 生态批评	281
第一节 生态批评的起因	282
第二节 生态批评的理论观点	285
第三节 生态批评实践	297
第十四章 伯明翰学派与英美文化研究	306
第一节 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观念	306
第二节 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	310
第三节 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	317
第四节 文化研究案例分析	322
后 记	329

引 论

西方当代著名文论家韦勒克之所以不无骄傲地把 20 世纪称为“批评的时代”^①，是因为他深刻地洞察到西方此期的文学批评已经发展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世界性的潮流——包括批评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批评方法的革命和批评活动的地域的拓展。的确如韦勒克所指出的，同 19 世纪相比，西方 20 世纪的文学批评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批评观念层出不穷，从精神分析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和文化研究，各种批评流派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共同构成了西方 20 世纪文学批评互竞共荣、空前繁荣的景观。

作为对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进行较为系统介绍和阐述的文学批评教材，面对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如此多姿多彩又丰富复杂的景观，我们首先应该怎样从理论总体上来把握我们的研究对象呢？这里，美国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四要素”的文学分析图式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思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分别是世界、艺术家、作品和欣赏者。在他看来，文艺批评史上所有对艺术品本质和价值进行的阐释（即文学批评），都多少考虑到了这四个要素。然而尽管如此，但最终只明显地偏向于其中的一个要素。这也就是说，从柏拉图开始的整个西方文论史，几乎都是围绕着这四个要素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各有侧重的理论探求，西方文论史因此才会产生与世界、艺术家、作品和欣赏者这四个要素分别对应的模仿说、表现说、客观说和实用说。^② 尽管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四要素”的文论分析图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容纳性，致使文论史上一些貌似相似实则相互冲突的理论都被网络其中，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方便的操作方法，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这种分析图式来呈现出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四个方面的基本主旨：语言学

① [美]R. 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6 页。

②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6 页。

与文本概念的呈出，精神分析与作家的死亡，解释学与读者的出场，意识形态与意义的颠覆，分别对应于文学活动的四个维度，即文本、作家、读者和世界。

一、语言学革命与文本概念的呈出

在西方传统文论中，语言是透明性的工具，作家以语言为媒介可与世界打交道，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成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发现，我们的一切存在于语言的奥秘中，解释语言就能解释一切。我们不可能直接与世界打交道，我们与世界之间横隔着语言符号这一中介。语言不是作家反映世界的工具，语言本身自成系统。因此，语言成为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

语言学研究对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革命性意义。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揭示了语言的自足性和系统性，工具论语言观退后，文学文本的语言性被突出。语言并不是透明的，语言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在所指上滑动，语言并不由其对应的世界图像获得意义，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自身的区别和延异中，因此，文学作品并不反映世界，文艺与世界的关联被否定，独立于世界和作家的文本被突出。索绪尔之后，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那里，语言学把传统的作品改变为文本。在传统文艺理论派看来，作品(writing)的根源是作家(writer)，是作家创造了文学作品。因此，文学批评就是找出作家与文学的关联，作家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之源；语言是作家反映世界的工具，作家就是运用语言去反映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因此，作家与世界的关联是文艺理论的主题。但是，在语言学革命后，文学文本因为语言的自足性而与世界无关，文学与时代，与作家，与环境的关联被切断。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衰落，作家批评、传记批评、社会学批评隐退，与其相关的系列美学概念如典型、再现、模仿、本质规律等都被认为是虚假命题。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将人们的视线从对文学外部因素的关注转移到文学自身的语言，文学的审美性得以呈现。英美新批评切断了文学的外部关联，作家的生活、诗歌的历史背景、读者的反应以及社会的文化的哲学的经济的背景都被排除在文学之外，文学文本独立于自身。新批评的对象是现代诗歌，强调的是诗的张力、悖论、含混和双关语，这些被视为诗歌的决定性因素，后来的解构主义则把含混推向所有的语言。对于语言学模式来说，需要研究的是结构而非内容，因为，如果它关心的是内容，那么它将把所有人类知识纳入其研究范围。语言研究无关语言中所说的对错，而是处理语言自身的规则。结构主义把语言扩展到人类的一切意义行为，如亲戚关系、婚姻风俗、饮食习惯、文学乃至广告等，都被视为语言，都是符号的意义系统，结构主义试图去发现系统中的使意义得以构成的结构。结构主义认为，没有什么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批评的目的是揭露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这就发展到解构主义了。解构主义要求我们注意文学假设的意识形态陷阱，试图把我们从中解放出来。它认为，传统的文学概念是精英主义的，其意识形态功能是维护资产阶级霸权，文学是非“自然的”行为。

罗兰·巴尔特在其论文《从作品到文本》中，梳理了传统文学理论的作品(writing

或 work)到现代的文本(text)概念的流变。在传统文论中,作品是人工制品,作者具有完全的控制权,作家作为个体性的天才,其想象力和独创性生产了高度原创性的作品。文本和文本性概念(textuality)则不同于此。作家不再是文本的主要生产者,或者说,作家不再等同于文本。在巴特看来,作家本身就是一个文本性的产品:是语言在言说,而不是作家在言说。即是说,作家变成了更大的文本的一部分。这种观点认为,文学文本是由多重话语交织的意义之网,其结构是多层次的,不能化约为单一的固定的意义,一次阅读只是抓住了文本的某一个方面,而文本是多重本质的,需要反复阅读和不断解释,因此,对终极意义的追寻是徒劳的。巴特认为,阅读是一种游戏。游戏(play)概念表明语言的意义不是固定的和单一的,而是向多重意义之流开放的。这样,巴特不仅把重点从作品转向文本,而且转向了读者。在后现代和文化研究领域,文本这一概念不仅指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学,而且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电影、绘画、广告、狂欢节、度假村等都是需要解读的文本。这样,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差异被抹平,其中的等级制被去除。^①

文艺理论的后现代演变也更适合文艺理论的全球对话。文本是开放的,向历史中无限延伸的读者开放,文本的意义实现于读者的阅读。文本不仅为一个文化内的读者所接受,它还向一切文化开放,向一切时空开放,一切文化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其意义是延宕的,任何一种解释都是对文本意义的补替。因此,后现代的文本理论更适合全球对话和交流,因为一个文化里的读者可阅读出另一个文化作品新的含义。一个文本向全球流通,不断地向其他文化进行意义的撒播,也就不断地得到新的意义的补替。这样,文学作品的意义实现于文化交流和文化碰撞,文本概念为文化对话和创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存在论解释学与读者地位的提升

读者是艺术和现实之间的中介,艺术的社会功能首先是对读者产生影响,而读者的阅读活动是否能够产生社会作用以及产生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取决于多种语境——大众既可以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阅读活动是文本、读者和文化语境的融合。这样,在哲学美学的演化中,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逐渐转移到读者接受。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来自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胡塞尔认为,主体和对象都是无限联系的网络之焦点,主体具有前见,对象则深陷历史纠缠,这样,人言人殊,每个主体所面对的客体各不相同,而真正科学的知识应是普遍必然的,这就需要把主体和客体背后的网络悬置起来,以纯净澄明的主体面对纯净澄明的客体,本质才可能显现,每个人所见才是相同的。到海德格尔,客体的括号仍然存在,但主体的括号已被打开。海德格尔揭示了人的存在的解释性,解释不是应用性的阅读活动,解释就是人的存在本身。存在的意义存在于此在的理解中,而理解的前提是“前结构”(vorstructure),是“前结构”“组

^① Roland Barthes. From Work to Text. in Niall Lucy.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p. 285-290.

建着解释”。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不是白板一块，被动刺激，而是有此“前结构”，它构成我们审美活动的基础。伽达默尔把海德格尔的概念改造为“前见”，理解发生于“前见”(prejudice)或“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前见”构成了人的历史存在，在任何理解活动发生以前，人都有由学习语言而来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和情感态度，这就是理解活动发生的前提。人是历史的存在，对于个人而言，历史和文化传统是先在地占有我们，而不是我们占有传统和历史。人在理解中存在，而“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理解总是语言性的，语言并不只是人们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负载着传统，人们不能拒绝学习语言，他一出生就要学习语言，人通过学习语言而被抛入传统，学习语言就是学习传统，只有学习了负载着传统的语言，他的理解才有可能。我们借以理解说明对象的语言就是先在地占了我们的传统，它构成了我们理解活动的基础。理解并非镜子式的在精神真空中开始，“前见”作为人们理解的基础包含着人们的过去，包含着人们所习得的语言及其中蕴涵的文化。与新的可能的理解(未知)相较，“前见”是已知，理解就从这已知出发。它使我们向未来世界的开放成为可能，这种开放是无尽的。“前见”是从旧知到新知的桥梁。

理解的前提又可称为“视域”(horizon)，这个词本指高山的雪线、地平线，喻指人的视野，或理解的起点、视角，它包含着决定理解得以实现的文化传统和背景。理解文本并不是寻找作品的原意，作品本身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它的语言、风格、内容构成了它特定的“视域”。读者也有一个“前见”，一个“视域”。理解的形成、意义的发生就是作品的“视域”与读者的“视域”的融合，即“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伽达默尔说：“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①可见，到伽达默尔，客体的括号也已经打开，传统与现在、作品与读者、客体与主体就在两视域的融合中暂时消除了张力，作品(传统)因为有了新的理解而拥有新的意义，开拓出新的生命；读者因接纳了新的视域而获有新知。主客体在双向融合中都迈向了一个新的视域，所谓“效果历史意识”指的是理解中的“视域融合”现象，也就是解释学的真理必然包含着理解着的个人，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②历史根本不是主体的客观认知对象，不是如自然科学中排除主体的对象，而是包含着主体自身的创造性的理解。因此，历史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开放的，它不断地向新的理解开放。

从欣赏到解释，字面变化的背后是理论范式的转变。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含义是固定的，欣赏就是对作品含义的理解和接受，就是去领会作者对象化到作品中的意图，因此传记批评就是从作家的生平传记寻找文学作品的意义，以作家解释作品。中国文论说文如其人，西方文论说风格即人就是如此。在此，读者是被动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93页。

②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5页。

的，读者的任务是去接受先在的作品中的意义。作品高于读者，作家也高于读者。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改造提升人类灵魂的园丁，而读者则是需要教育提高的对象，这一现象与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垄断教育而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教育的状况相关。在解释学那里，作品欣赏变成文本解释，解释就是对文本含义的创造或补替，解释活动是积极的正读或创造性的误读，但解释活动又是由文本本身的虚实结构决定的，因此，文本的解释并非任意，文本的实体性结构规定了接受的方向和可能性。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结果是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不是一千个贾宝玉。文本的审美接受完成于读者的阅读，文本的存在是解释性的，只有获得了阅读接受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审美对象。因此，读者构造了审美对象，读者的阅读活动是文本变成审美对象的决定性条件。文本的意义在对象的结构与读者的接受前见之间的互动中完成。因此，读者在后现代视域中被突出。从对象看，文本因为镶嵌于历史和语言文化系统中而不存在客观固定的意义，从主体来说，因为个体读者前见的差异，文本的解释活动是无限绵延的，这样，后现代的读者和文本概念赋予了传统文学作品无限可能的开放性。

新批评把文本的语言本身视为意义之源泉。但是，显然，没有读者的接受，文学的审美价值无法实现，文学文本就是一个与石头、板凳无差别的物。《红楼梦》的意义存在于接受的历史之中，存在于历史性的不断演绎改造言说之中，没有历代的人的评论、表演、阅读，《红楼梦》就没有生命，没有历史。是读者把文本从审美客体变成了审美对象，实现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没有读者的阅读，作品的社会意义、审美价值无法实现。读者在阅读之后，以审美的自由视域构造理想，参与世界，又参与到文学活动的循环。读者是各个不同的，他们交错于社会历史轴线如阶级、年龄、性别、宗教、种族、民族、文化等，这些构成了多重话语，交互影响着读者的阅读活动。文学理论中读者的出现一方面是哲学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则是社会民主化的结果，它是个体的民主权利在文学活动中的呈现。文学文本向文化语境开放，是文化语境给予其多重意义，其多重意义最终决定于读者的多重性，读者本身是具有差异性的，这才使得文本意义具有开放性，意义的中心性、权威性、单一性就此瓦解，读者理论的政治性突显出来。

三、精神分析与作家的死亡

西方古典文论认为，作家是作品意义的权威来源，优秀的艺术作品是天才的独创性的产物。在康德的主体性哲学中，人的先验时空能力和知性能力决定了知识如何可能，是人为自然立法；在伦理领域，绝对律令支配了人的意志行为，是人为自我立法；在艺术领域，天才创造了艺术，是人为艺术立法。天才可遇不可求，拥有歌德这样的天才是德意志民族的幸运。天才受之于天，不假外力，政治鼓动和金钱投入都不可能产生天才。那么，天才有哪些规定性呢？康德给出了四点：^①一是，天才的创作

^① 参见[维]康德：《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2页。

没有任何确定的规则可供使用，独创性是天才的第一个特征。但独创性并不意味着肆意妄为，这就有了第二点，即天才的创造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必须具有典范性。天才的作品不是通过模仿产生的，但它却是其他作品评判的标准。既然天才的作品是其他艺术品的准衡和评判的典范，为什么天才不能指出其艺术创造的规则呢？这就有了第三点：天才无法解释自己的创造过程，无法传授规则给他人去创造同样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艺术创造与科学发现不同，后者有一定的规则可遵循，这样就到了第四点：天才为艺术而不是科学制定规则。按照天才的规定，康德认为，天才和模仿是对立的，博学的能力不能称为天才，只要他是按照规则走研究和思考之路，就不是天才。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伟大的牛顿也不是天才，因为牛顿可以把自己发现宇宙原理的过程直观地演示给别人看。牛顿与刻苦的学徒只有量而非质的区别，虽然我们应该对牛顿的贡献表示敬意。与科学家不同的是，伟大的诗人不能展示他们那些丰富的审美意象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也不可能把这一过程教授给别人，其创作得之于天，如曹丕所言，文以气为主，虽父兄不能相传。因此，对于精美的艺术，常常是人亡艺绝。天才的作品具有典范性，但这种典范性不能概括在一个公式里，不能以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典范性只能表现为导向性，即天才之作可作为另一个天才的引路人和激发者。康德说，假如自然给一个学徒配给了与其师傅类似的心灵能力，天才师傅的观念就可能激发他的学徒产生类似的观念。艺术作品是传达天才典范性的媒介，是通向另一个天才的桥梁。康德的天才理论是西方文论史上关于天才的最经典的文献，但细看发现，康德对天才到底是如何创作的，其实是持不可知论，比柏拉图并未前进多少。事实上，这一问题迄今为止仍未有所进展，人们能够讲清楚一般的感知，但审美感知是如何运作的仍不得而知。20世纪西方美学倾向于认为，审美活动是黑匣子，不可探其奥堂。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赖于脑科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推进，我们不可苛求两百多年前的康德了。

在20世纪之前，人们认为伟大的作家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是可遇不可求的灿烂明星。但是，到了20世纪，人们发现，作家并非超越常人的天才，有些在道德品质上甚至低于常人。把作家拉下神坛的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作家在幼年遭受心灵创伤，艺术创作是原始欲望的升华。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认为，作家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载体，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天才理论衰落了，其原因，一是，天才理论依附于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强调人的主体创造精神。在主体概念因其人类中心主义嫌疑被哲学抛弃之后，依托于主体性哲学的天才理论也就衰落了。二是，古典时期，西方文论的主题是作家本体，作家本体强调作家对于文本的权威性，认为作家是作品意义之源。20世纪西方文论转向文本和读者，传统文论把作品的意义追溯到作家及其世界关联被视为“意图谬误”。三是，天才说把艺术创造神秘化，把艺术家区别于一般人。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分析学把作家拉下马，作家高人一等的形象被解构，笼罩在作家身上的天才之光也被祛除。到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以及解构主义文本理论，阅读活动被视为参与了作品审美意象的生成，读者成为与作家平起平坐的创造者，作家不可企及的

超越地位进一步衰落，天才就不再是美学的关注之点了。新批评对意图谬见的批评，废除了作家的权威，到巴特，作家则彻底消失了。巴特说，是语言说出了作家，意义的多元性来自读者，而非作者；读者的出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福柯在论文《何为作者？》中说，作者与西方文化中个性化(individualization)的出现相关，有名有姓的个人与知识的生产联系起来，作者授予其身份给不同形式的文本。当这些文本流传在社会之中，作者就提供了辨识之点。福柯考察历史，发现在17世纪前，作者的地位不是很重要，那时不需要作者的印章，作品的接受更是匿名的。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以及新的所有权法律的出现，文学文本成为个人主义的更具有意义的标志，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作者的地位才提升了。在此，福柯提出了一个与常识相反的观点，即作者不是先于文本而存在，反倒是跟随文本而来。^①他的意思是，只有在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作品流传在社会之后，我们才有了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是先读了作品，才知道作者本人的。

四、意识形态概念与意义的颠覆

在当代文化理论中，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概念。当代意识形态理论关注政治斗争中的策略问题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运动问题，其兴起的客观原因是，文化工业的发展导致大众意识的变化，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认同以及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这些现象引起了众多理论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思考，也引起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意识形态是主观观念性的还是客观物质性的？意识形态是被物质存在决定的还是自治性的话语结构并具有自身的效果？意识形态是否为虚假意识，它是否能够洞察世界，是否代表了特殊阶级的利益？意识形态斗争是如何展开的？被统治阶级与宰制性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意识形态在维护霸权中的功能如何？意识形态与自由思想和纯粹知识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问题不断地被讨论，歧义纷纭，难以获得一致的答案。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指的是虚假的抽象的理论体系，资产阶级借以掩盖其统治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否定性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以之意指黑格尔的思辨体系、宗教信仰、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包括三层意涵，首先是唯物主义前提：观念反映了它们产生于其中的物质性条件和环境；其次是决定论：观念最终决定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最后是社会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的对应关系，即统治性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此后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的观点多有批评：说思想是反映性的，是否认了思想具有特殊的效果，否定它们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按照索绪尔的理论，这种观点忽视了语言能够对现实的真实性构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说思想最终决定于经济，

^①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Josue V. Harari, *Textual Strategi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42-148.

这是经济化约论；把一个阶级的统治性等同于某种思想，是否定了这种思想也可能为其他阶级所有。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观念提出质疑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是阿尔都塞和葛兰西。阿尔都塞认为，法律、家庭和教育系统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经济条件同样重要，文化既不是单纯依赖经济关系，也非独立于经济基础之外；语言只是提供我们关于现实的某个中介，而非现实本身；意识形态无关错误与否，而只是一个构架，这一构架让我们能够解释、认识、了解我们的物质生活，从而构建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在阿尔都塞看来，主导意识形态把实际上是政治性的、偏私的东西转变成为某种似乎是自然的、普遍的东西。主导意识形态不限于政治的或经济的领域，它的主要角色是构造市民生活的想象性图景，在这种图景中，每一个个体似乎是独特的自由的。阿尔都塞指出，个体之所以能够很容易地被纳入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帮助他们理解世界，进入符号秩序并把权力归于他们自己，他们在意识形态中把自己看做独立的、强大的，就如青春期的少年看自己那样。意识形态提供的是个性化的虚假解决，这一运作过程是通过内在化实现的，即我们外在于我们的思想范畴的界限之内自发地言说，是这些思想范畴思想了我们，而非我们在思考它们，这就是主体的质询（interpellation）。质询概念来自弗洛伊德，拉康以质询解释个体如何经由语言进入意识形态。在拉康那里，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是借助精神分析过程考察主体是如何生成的。但是，精神分析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没有给予个体或共同体足够的空间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其世界中，没有产生它们自己的意义，没有给予个体反抗的领地，没有考察在地化的差异（local differences），没有注意个体结构其自身和其生活的策略和实践。

当代理论家借助语言和话语理论试图打破经济决定论。通过语言这一媒介，物被表征于思想，这样，在媒介中，意识形态得以产生和转变。但是在语言中，同样的关系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表征和解释，因为语言本质上与其所指对象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多重意指性的（multi-referential）：它能够围绕同样的社会关系或现象构造不同的意义。罗兰·巴特的符号学认为，意义不是产生于所指即现实世界的物质客体，而是产生于符号系统中，因此符号就是多义性的。比如破旧的牛仔裤本来是贫穷的表征，但在另外的语境中则意味着时尚；万宝路广告中的男人可能意指粗犷，在另一个语境中则可能意指癌症。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语言的多声部现象，即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语言被所使用的人生产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义。比如“黑色”传统上被西方主流文化视为包含着负面的意义，但在黑人民权运动高涨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色被赋予了肯定的积极意义：“黑色是美丽的。”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使用同一种语言，结果是，不同方向的重音（intersecting accents）交叉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中，意识形态场域常常相互交叉着重音，不同的利益在此争夺，这样，符号就变成了阶级斗争的领地。

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霸权的获得是通过把主导性的价值观结合于大众的常识而成为可能的。常识是自发的大众思考形式，它是历史性的、碎片化的、杂乱的、偶发

的。常识不需要推理、争论和思想，它是可得的、完全可知的、广泛分享的。它好像一直就在那里，沉淀着，似乎是自然的智慧。但常识有一定的内容，有其自身的历史，斯图亚特·霍尔指出：“常识的当代形式通过先前体系化的意识形态系统的碎片和轨迹来投射；其意指之点是作为特殊时代和社会里的智慧，在传统主义的光芒映照下，什么东西毫无例外地运作着。”^①构造着的意识形态就这样被自然化、内化为人们的常识。常识有助于我们以简单的有意义的方式把世界予以分类。常识元素构成了大众的实践性思考(practical thinking)，葛兰西认为，就是在这个层面，意识形态斗争最有可能发生。

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的发展，在今天，意识形态具有多方面的含义，约翰·斯道雷总结了主要的五种意义。第一，意识形态可以指某一特定群体的思想体系。第二种意义暗示某种掩盖、歪曲和隐瞒，它指的是意识形态用以掩盖掌权者统治现实的方式：统治阶级并不把自己视为剥削者或压迫者。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出意识形态用以掩盖无权者被统治的方式：被统治阶级并不把自己视为被压迫者或被剥削者。意识形态的第三个含义指的是“意识形态模式”，其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各个作品(电视小说、流行歌曲、小说、故事片等)表现世界的方式。此定义的基础是这样一个观念，即社会充满了冲突，而不是一片和谐。在这种冲突中，作品会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一方。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作品最终都与政治有关，它们给世界存在的方式赋予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意识形态的第四种含义是阿尔都塞赋予的。阿尔都塞不只是简单地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系列思想，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物质实践。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而不单单是在关于日常生活的思想中碰到意识形态问题。比如，我们可以把海边度假和庆祝圣诞节看作意识形态实践活动，它们以某种方式给了我们乐趣，并使我们从社会秩序的清规戒律中获得暂时的解脱。但是它们最终又让我们回到我们在社会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上来，精神振作地准备忍受对我们的剥削和压迫，直到下一个法定休息时间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是为了再造资本主义经济环境和经济关系继续存在所必需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第五个定义与巴特有关。巴特把语言分为内涵和外延，联想意义发生在内涵层面。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相互斗争的阶层和集团会赋予不同的意义，阶级斗争就在这一层面以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②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并具体实践于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现代西方文化工业，后殖民理论对作为学术形态的东方学和西方经典文学的帝国主义霸权意识的分析，女权主义对文学文本和日常生活中的男性意识形态霸权的批评，伯明翰学派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整个来说就是意识形态分析。在颠覆霸权意识形态的同时，被压制的边缘获得了解放：解构了性别中心，产生了女性主义理论；解构了常规，产生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解构了欧

① Stuart Hall.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in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 Janet Woollacott.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Sage Publications, 1977, p. 325.

②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洲中心，产生了后殖民理论；解构了优先性(privilege)，产生了反种族主义理论等等。

西方 20 世纪文学批评四个方面的基本主旨已如上述，在本书的后面章节，我们将具体展开对西方 20 世纪文学批评一些重要流派的介绍和评述。

第一章 精神分析批评



基本概念

- | | |
|--------------------|-------------------|
| 1. 精神分析批评 | 2. 性本能 |
| 3. 本我 | 4. 自我 |
| 5. 超我 | 6. 无意识 |
| 7. 前意识 | 8. 意识 |
| 9. 升华 | 10. 幻想 |
| 11. 白日梦 | 12. 凝缩 |
| 13. 移植 | 14. 象征 |
| 15. 润饰 | 16. 俄狄浦斯情结 |
| 17. 厄勒克特拉情结 | 18.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
| 19. 霍兰德的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 | 20.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 |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对人类精神心理领域的探索,是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开创者,与19世纪的巨人达尔文、马克思、尼采等重要的思想家并驾齐驱。”^①弗洛姆曾说:“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都是现时代的设计师。”^②弗洛伊德1900年出版的名著《梦的解析》是精神分析学形成的标志,被认为是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并列的而导致人类三大思想革命的划时代的不朽巨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精神分析引论》等著作的出版而获得丰富发展,30—40年代流行于欧洲,40—50年代由于新批评派的风靡而一度受到冲击,50年代以后,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由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主要以欲望、无意识、梦、幻想等人类精神活动为研究对象,因此其理论与观

① [美]斯佩克特:《弗洛伊德的美学》,高建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② [美]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